

# 农村外出妇女的生育意愿分析

——安徽、四川的实证研究<sup>\*</sup>

尤丹珍 郑真真

**Abstract:** This paper compared fertility desire of the migrated and never migrated women in rural China,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from 4 counties in Anhui and Sichuan, 2000. The contents of fertility desire include ideal number of children and sex preference. The influence of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nd migration experience to fertility desire are also analyzed.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 that the desired number of children of ever-migrated women is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that of never migrated women. The influence is less significant if the women have returned home for a longer period.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ever-migrated women, regardless of the difference in migration experience.

## 一、研究背景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中国掀起了农民外出务工经商的浪潮,往返于农村和城市之间的打工者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边缘群体”——流动群体。据估计,这一群体的人数已近亿,并且仍有强势增加的趋向(段成荣,1998)。

由于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模式,流入城市的农民往往会在观念和行为方式上受到来自于城市社会的巨大冲击,加之流动本身带来的生活的不稳定性、职业的频繁变更性、行为的短期性,使他们在观念和行为方式上有别于其家乡人,从原有的农村社群中分化和剥离出来;然而农村文化在他们身上烙下的印迹以及制度的限制又使得他们很难真正地融入城市社会,从而造成他们对城乡两种文化的双重不适应,成为一个既游离于农村和城市之外又与农村和城市有紧密联系的边缘群体。在这个群体中,平均大约有1/3为女性,且以15—35岁年龄段的人居多(陈再华,1996;陈浩,1996),这个年龄段正是妇女婚嫁生育的集中期。因为在人口管理上属于易遗漏的群体,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妇女相对于其乡里人而言有着更为广阔的生育自由度。在这种背景下,作为生育主要载体的妇女的生育观念在外出前后有无变化,有怎样的变化?外出对妇女的生育观念是否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流动妇女的生育观念与流出地的妇女是否有差异,有怎样的差异?是什么因素影响了这些变化和差异?本文将就这一系列问题进行探讨。

有学者认为,在多数发展中国家,生育意愿是决定生育行为变化的主要因素(Pritchett, 1994)。中国流动农民的规模已非常庞大,且流动农民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一个新兴的群体,

<sup>\*</sup> 本文系福特基金会资助项目“迁移对农村妇女的影响”研究成果之一。有关该项目总体情况的介绍请见:解振明执笔,2001;郑真真,2001。

弄清这个群体的生育意愿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和把握农民的生育观念以及未来生育率的可能走向,从而对全国的人口发展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

关于迁移流动对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影响,西方学者提出了四种理论模式,即选择模式、适应模式、干扰模式和中断模式,认为迁移流动有利于降低生育率(默斯顿,1985)。国内有学者认为这些模式同样适用于中国的流动人口,且几种模式同时并存影响流动人口生育意愿和行为(谭晓青,1994;王平权,1996)。国内自70年代以来有不少对生育意愿的调查研究,但尚缺乏以流动人口为特定对象的研究。80年代后期开始有对流动人口的生育行为的研究。如1987年的“中国74城镇人口迁移调查”在我国第一次取得了迁移流动人口生育状况的资料,对这项调查的研究表明,在各个年龄组中迁移妇女的生育水平低于其迁出地的非迁移者;对1988年2‰人口生育、节育抽样调查数据也得出了相类似的结论(杨子慧,1991;谭晓青,1994;敖再玉,1990)。周祖根的研究表明流入上海的流动妇女的生育率低于其原住地(主要是浙江、江苏和安徽)的生育率(周祖根,1993)。有学者分析1997年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资料的结果显示,流动妇女的理想子女数和曾生子女数均低于农村未外出妇女(伍先江,2000;黄润龙,2000)。

以上研究描述了外出妇女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解释,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思路和依据。遗憾的是这些研究大多不是专门针对外出妇女进行的,且几乎都是在流入地进行调查得到数据进行分析的,难以找到相应的参照人群。作为一种尝试,本文试图利用流出地的调查资料,从另一个角度考察外出妇女的生育意愿。

## 二、理论框架和研究设计

### (一)概念界定

由于“流动”这一概念在国内外学界的不统一性,且由于在流出地做调查时,被调查的这批妇女并不处于流动状态,因而我们避免使用“流动妇女”这一术语,而采用“外出妇女”来称呼。本文中的“外出妇女”是指到调查时点为止曾经离开户口所在地到县城或县城以远外出务工经商一个月以上的妇女;“未外出妇女”是指到调查时点为止从未离开户口所在地到县城或县城以远外出务工经商或不到一个月的妇女。

生育是具有三维特征的事件,即子女数量、性别和生育时间(顾宝昌,1992),从理论上讲,考察生育意愿应当也包括这三个维度。但由于生育时间问题在问卷调查中较难操作化,加之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我国大部分生育意愿调查内容实为理想子女数和理想性别结构。一些国外的生育意愿调查还包括生育意愿的强度及相关的感觉等测量(Thomson & Brandreth, 1995),但这些测量在我国特定背景下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还有待验证。本文研究的内容只包括理想子女数和理想性别结构,并统称为生育意愿。

### (二)理论框架

根据选择模式说以及一些实证研究结果,个人特征和其原住地特征(即当地社会经济状况、人口外出状况等)会较大地影响外出决策,使妇女作出外出还是不外出的抉择。如果根据外出经历将妇女分成两类:未外出妇女和外出妇女,则这两类妇女的生育观念受到原住地的生育文化和生育政策以及个人特征(即其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等)的影响。

适应模式理论认为由于农村生育水平普遍高于城市,因此无论迁移者个人特征如何差异,

他们在迁移前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基本上与迁出地非迁移者相同。对从农村迁到城市的迁移者来讲,当他们进入城市,经过一段时间城市生活潜移默化的影响之后,会在观念、生活习惯等方面逐渐与城市居民相适应,这样他们会逐渐改变和最终放弃原有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生育模式必将趋向于城市居民的生育模式。无论个人特征和客观条件如何变化,迁移者的生育率经过一段时间会趋近于迁入地居民的生育水平。城乡差别越大,农村迁移者到城市后的生育水平与迁出地居民的差距越大。根据这种理论,影响外出妇女生育观念的因素应当包括外出后流入地的生育文化和其外出经历(即流入地类型、外出时的年龄、滞留时间、外出后的职业、收入、交往群体、与家乡的联系等)。

生育就其本身而言是一种自然过程,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种自然过程会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对于有意识并且懂得如何控制生育的人类而言,生育的自然特征已经淡出,生育这一事件体现出来的更为主要的是社会文化特征,特定的社会文化和社会经济及个人特征塑造就特定的生育意愿。我国不同地区 20 年以来一直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这一因素无疑对居民的生育意愿有决定性的影响。

从当前中国的情况来看,影响农村妇女的生育意愿的因素主要有几个层面。在社区层面上,主要有妇女所在农村社区的社会经济状况、生育文化和计划生育政策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宣传和执行情况;在家庭和个人层面上,则有家庭经济水平、妇女年龄、妇女文化程度、个人偏好、丈夫文化程度等因素。

然而对于外出妇女而言,在社区层面还包括流入地生育文化的影响,在家庭和个人层面还包括其外出本身和外出经历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对这些因素的综合考虑构成了本研究的理论框架。

本文将对理论框架中所有可操作和可获得的变量与生育意愿的关系进行综合考察。

### (三)研究思路

根据迁移与生育关系的理论和以往的实证研究成果,本研究假设外出妇女在年龄、文化程度等个人特征方面有一定的选择性,即往往是年轻的、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村妇女更易于外出,构成了外出妇女的主体。由于具有选择性特征,外出妇女的理想子女数在外出前就略低于其原住地的未外出妇女。因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回顾性的调查而不是追踪调查,所以无法获得曾外出妇女在外出前的生育意愿。在以下的定量分析中将通过控制有关选择性特征的变量来排除由于这些特征所引起的生育意愿差距。

本文将比较外出妇女和未外出妇女的生育意愿,并着重分析外出经历对妇女生育意愿的影响,目的是验证外出是否能够减少妇女的理想子女数并弱化生男偏好,不同外出经历是否造成外出妇女内部生育意愿的差异,还有外出对妇女生育意愿的影响是否会随返乡时间的延长而减弱。

### (四)数据来源和分析方法

本研究数据来自国际合作项目“人口流动对中国农村妇女的影响”。调查于 2000 年 8 月和 9 月分别在安徽、四川 4 个县的 38 个村进行,总计调查了 3186 位 16—40 岁的妇女(包括外出返乡的妇女和从未外出的妇女)。这个年龄段外出妇女比例较高,而且这一年龄段的妇女正经历着或者刚刚完成生育过程,有着相对较为明确的生育观念。

在我们的调查中,采取询问“您认为一个家庭最理想的孩子数是几个?其中几个男孩,几个女孩,几个无所谓男女?”而得到妇女的生育意愿。必须指出的是,在实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

的背景下,农村妇女是否能够向调查员吐露自己的真实想法令人怀疑,因为当妇女的理想子女数多于政策规定的家庭子女数时,妇女很可能在接受调查时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而报告一个接近于政策规定的理想子女数,因此我们得到的理想子女数很可能是“受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的有条件的生育意愿”(乔晓春,1999)。由于意愿本身的隐蔽性以及模糊性,如何测量理想子女数一直是困扰学界的一个难点。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可以透过这种有条件的生育意愿分析人群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因为在相同的政策背景下不同人群之间如果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必然能够反映政策之外其他影响因素的存在。

本研究主要利用定量分析方法,主要采用双变量列联表分析和 logistic 回归分析。所用分析软件为 SPSS9.0。由于这次调查不仅包括问卷调查,还包括专题小组座谈和入户访谈,提供了丰富的定性资料,本研究将在最后利用访谈所得资料,对有关问题进行讨论。

### 三、结果和分析

#### (一)调查点和被调查妇女的基本情况

安徽两县农民外出历史较早,80年代初就有一些人外出打工经商,到90年代后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人外出打工。主要流入地为上海、沈阳、浙江和江苏的一些城市。外出的妇女大多经营个体买卖或者在企事业单位打工,主要从事零售、缝纫、手工艺制作、餐饮服务等工作。四川两县经济相对较为落后,农民外出打工始于90年代中期,但至调查时点止已形成了外出打工的风气,外出主要流入广东、新疆和浙江的一些城市,妇女外出期间主要在企事业单位打工,经营个体比例低于安徽外出妇女。被调查妇女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相对而言,有外出经历的妇女总体年龄结构比从未外出妇女年轻,安徽两县的外出妇女受教育程度高于从未外出妇女。对已婚妇女而言,外出妇女丈夫的平均受教育程度高于未外出妇女的丈夫。对外出妇女和未外出妇女个人特征比较后发现,外出妇女确实具有一定的选择性特征,这种选择性特征同时又是有利于降低生育率的一些因素,加之这些特征在外出前后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和不变性(如妇女在外出前和外出后的受教育程度基本不变),因而可能外出妇女的生育意愿在外出前就有别于未外出妇女。

调查点所在县的大部分地区都基本实行“女孩户开小口”的计划生育政策,规定一个家庭第一胎如果是男孩则不能再生第二胎,第一胎如果是女孩,则可以间隔4年后再生一个孩子。

#### (二)生育意愿概述

从调查数据来看,想要两个子女的妇女最多,约占70%;其次为想要1个孩子,想要3个或3个以上子女的妇女不多,仅有5位妇女表示不想要孩子。安徽和四川外出妇女只想要一个

	被调查妇女基本情况 (%)	
	安徽两县	四川两县
样本量	1565	1621
年龄结构		
16~24	11.3	14.6
25~29	31.2	40.1
30~34	41.9	35.3
35~40	15.9	10.0
受教育程度		
文盲	29.8	4.8
小学	49.4	68.5
初中	19.7	24.5
高中及以上	1.3	2.2
已婚妇女比例	97.4	98.9
曾外出妇女的比例	43.8	28.8

孩子的比例分别高于未外出妇女 12 个百分点和 9 个百分点。卡方检验表明外出与从未外出两组妇女之间的理想子女数有显著差异。

从前文可知, 外出妇女相对于未外出妇女而言年龄结构较年轻, 而由于所处时代的不同, 可能年轻人比年长者更倾向于少要孩子。从调查数据可看出, 随着年龄的增加, 外出妇女和未外出妇女理想子女数为一个的比例均下降, 而想要两个子女的比例则上升(见表 2), 说明年龄确实影响妇女对孩子数的期望。控制了年龄以后发现, 在各个年龄段内部, 安徽外出妇女和未外出妇女的差异仍然十分显著, 各个年龄段均出现外出妇女只想要一个孩子的比例比未外出妇女约高 10 个百分点而想要两个孩子的比例同幅度下降约 10 个百分点的现象。而四川的理想子女数并没有明显的线性变化(见表 2)。

表 2 分年龄外出妇女和未外出妇女的理想子女数的分布 (%)

年龄组(岁)	理想子女数(个)	安徽		四川	
		外出过	从未外出	外出过	从未外出
16—24	0	0.9			
	1	50.0	36.7	59.0	41.5
	2	49.1	63.3	41.0	58.5
	样本	114	60	83	142
25—29	1	30.4	22.0	40.2	33.6
	2	69.2	77.1	59.8	66.4
	3+	0.4	0.8		
	样本	250	236	199	431
30—34	0				1.0
	1	25.7	15.6	32.4	25.1
	2	71.8	81.7	67.6	73.2
	3+	2.4	2.7		0.7
	样本	245	410	139	418
35—40	1	24.0	13.4	11.8	26.0
	2	74.7	81.4	85.3	73.2
	3+	1.3	5.2	2.9	0.8
	样本	75	172	34	127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外出妇女和未外出妇女的理想子女数都集中于 2 个和 1 个, 其中两个省份之间及各个省份内部外出和未外出妇女之间的差异只在于想要 1 孩和 2 孩的比例。两组妇女之间的差异说明, 在生育数量上外出妇女更偏向于少生, 其原因可能是: (1) 由外出妇女和未外出妇女本身的特征差异(如外出妇女文化程度高于未外出妇女)造成; (2) 外出流动使得妇女受到城市居民生育观念的影响, 且更注重寻求自身的发展, 从而减少了意愿生育数量。

进一步观察妇女对子女的性别期望, 结果如表 3 所示, 只想要一个孩子的妇女中约有 1/3 的妇女存在着男孩偏好。在想要两个孩子的妇女中, 有超过 70% 的妇女想要一男一女。在只想要一个孩子的妇女中有 1/3 的妇女想要一个男孩。大部分妇女期望得到性别平衡的完美结局。

从外出妇女和未外出妇女的比较来看, 两群体的性别期望构成大致相当, 控制了年龄、文化程度等因素后仍然没有太大差异, 这似乎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 外出对妇女性别期望的改变并不起太大作用。以下的多因素分析将只研究理想子女数与外出的关系。

表 3

安徽四川妇女对子女的性别期望

(%)

性别构成	安徽		四川	
	外出过	从未外出	外出过	从未外出
只想要 一个孩子	1 个男孩 31.4	34.8	24.3	28.2
	1 个女孩 3.2	5.0	12.1	6.5
	无所谓男女 65.3	60.2	63.6	65.3
	样本 213	161	173	337
想要 两个孩子	1 个男孩 1 个女孩 75.4	81.2	76.7	72.9
	2 个男孩 1.0	1.0		0.3
	1 男 1 无所谓男女 4.8	3.1	2.9	4
	2 个女孩 0.9			0.9
	1 女 1 无所谓男女 0.5	0.3	0.7	0.5
	2 个无所谓男女 19.7	14.4	19.6	21.4
样本	456	681	275	768

### (三) 外出对理想子女数影响的多因素分析

为了控制相关特征变量的影响,本研究采用多变量 logistic 回归以考察是否外出以及外出经历对农村妇女理想子女数的作用,在回归分析中采用反向剔除法,只保留对模型有显著作用的变量。

由于在所有被调查妇女中只有 5 人不想要孩子,因此分析中不包括这 5 个案例;又由于想要三个及三个以上的孩子的妇女极少,因而和想要两个孩子的归到一组,最后可将理想子女数分成两种情况:只想要一个孩子、想要两个或更多孩子。于是因变量被定义为想要两个或更多的孩子(赋值为 0)和只想要一个孩子(赋值为 1)两类。控制变量包括当地社会经济情况(县,1999 年村人均收入,1999 年乡人均收入),妇女家庭经济情况(是否有楼房,是否有彩色电视机,对家庭收入水平的自我评价),妇女个人特征(受教育程度,年龄,婚姻状况)。如果仅对已婚妇女进行分析,则可以把妇女初婚年龄、曾生子女数、丈夫受教育程度、丈夫是否外出过也作为控制变量。

#### 1. 是否外出的影响

分析妇女本人是否曾经外出对理想子女数的影响,分为两个模型分别研究。模型 1 为所有有效样本,模型 2 只包括已婚妇女。自变量为妇女本人是否外出过。回归结果见表 4。其中,参数估计值大于零,说明相对于参照组而言,该组妇女理想子女数为 1 的可能性更大。由于表中所列为非标准化的参数估计值,因此各不同变量之间不具有直接可比性。

分析结果显示,妇女所在的县不同理想子女数也不同,暗含着当地文化、社会、经济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妇女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只想要一个孩子的可能性也越高;妇女的年龄对其期望理想子女数有较大影响力,随着年龄的提高,只想要一个孩子的可能性降低;已婚妇女只想要一个孩子的可能性要小于未婚妇女;在已婚妇女当中,初婚年龄越大的妇女只想要一个孩子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曾生子女数越多,只想要一个孩子的可能性越小。

当控制了年龄、婚姻状况、初婚年龄、妇女受教育程度、曾生子女数、家庭经济水平、丈夫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后,外出仍然对减少理想子女数具有较大作用,外出妇女只想要一个孩子的可能性高于未外出妇女。这一结果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在相同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水平

等条件下,外出确实能够减少妇女的理想子女数。

表 4 对理想子女数为 1 的 logistic 回归参数估计及其显著水平(p 值)

变量	模型 1(N= 3063)		模型 2(N= 3025)	
	参数估计	p 值	参数估计	p 值
县(参照组: 安徽 1)				
安徽 2	-1. 5525	< 0. 0005	-1. 7958	< 0. 0005
四川 1	-0. 2046	0. 1012	-0. 5972	< 0. 0005
四川 2	0. 0175	0. 8937	-0. 2027	0. 1278
妇女受教育程度(参照组: 文盲)				
小学	0. 2176	0. 1206	0. 3126	0. 0365
初中及以上	0. 3996	0. 0113	0. 3987	0. 0198
妇女年龄(参照组: 16- 24 岁)				
25- 29	-0. 4077	0. 0018	-0. 3464	0. 0099
30- 34	-0. 7639	< 0. 0005	-0. 3918	0. 0057
35- 40	-1. 0255	< 0. 0005	-0. 5078	0. 0075
乡人均收入	-0. 0004	0. 0011	-0. 0005	0. 0005
是否有彩电(参照组: 没有)				
有彩电	0. 2409	0. 0170		
婚姻状态(参照组: 未婚)				
已婚	-1. 0949	0. 0007		
初婚年龄			0. 0530	0. 0136
丈夫文化程度(参照组: 文盲)				
小学			-0. 6406	0. 0394
初中			-0. 6111	0. 0499
高中及以上			-0. 2980	0. 3933
曾生子女数(参照组: 0 个和 1 个)				
2 个及以上			-1. 4825	< 0. 0005
妇女是否外出过(参照组: 从未外出)				
外出过	0. 2700	0. 0026	0. 2335	0. 0121
模型总体的卡方检验显著水平		< 0. 0005	< 0. 0005	
模型的预测正确率		72. 7%	73. 4%	

## 2. 外出经历的影响

对于外出妇女而言,外出所到达的地区、外出期间的工作性质、外出期间与家乡的联系、外出期间与城市居民的交往状况等外出经历有所不同,这些差异是否能够带来生育观念的不同也是非常值得考察的。

一般而言,年轻人较年长者更容易接受新事物、新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对于外出的农村妇女而言,第一次外出能够遇到很多新事物、接触到很多新观念,而她们第一次外出时的年龄是这些新事物新观念能否被接受并内化于其言行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一次外出年龄与理想子女数的列联表分析,呈现了第一次外出年龄越小只想要一个孩子的比例越高的现象,且差别非常显著。

生育观念虽说是时代特征和个人特征内化于人而形成的,但这种观念毕竟和结婚生育联系在一起,因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也就是说,未婚妇女由于还没有结婚可能不会仔细考虑自

己想要几个孩子,对她们而言生育观念很可能还比较模糊;而对于生过孩子的妇女而言,其生育观念又很可能受到其曾生子女数的影响。如果把外出时段分为(1)初婚前;(2)初婚后生育前;(3)生一孩后;(4)至少生两孩后;(5)从未外出,通过列联表分析发现,至少生两孩后才外出的妇女只想要一个孩子的比例远远低于其他时段外出的妇女,甚至也低于未外出妇女,而第一次外出在其他时段的妇女总体而言只想要一孩的比例要高于未外出妇女。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当妇女完成了其生育过程以后再外出,外出对其生育观念的改变效应并不大。

妇女外出时间越久,就越有机会接触流入地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也越有可能融入流入地的社会之中,从而可能使其观念和和行为逐渐趋近于流入地居民。由于被调查妇女绝大部分都流入城市,因而可以假设外出妇女在外时间越长,其想要的子女数就会越少。在安徽外出妇女中确实能够观察到在外累积滞留时间越长理想子女数为1的比例就越大的趋势;而对于四川外出妇女而言,在外时间的长短对于理想子女数几乎没有影响。

外出期间的回家情况是妇女外出后与家乡的联系是否频繁的一种表征。大部分妇女外出后由于受到流入地居民的排挤和歧视,以及她们本身所习惯的农村文化和习俗与城市文化的差异,使得外出妇女很难完全融入到城市社会中,加上家庭依然在农村,因而她们往往不能割断固有的亲缘和地缘关系,有间期性回家的习惯。实际上,回家的间期性往往和农忙季节以及重大节假日相关连,但也与其他一些因素有关系(诸如流入地与家乡的距离、妇女对家庭的依靠感、在外从事的工作等)。频繁回到家乡的妇女与家乡的联系就多,由于外出造成的对家乡的陌生感和不适应感就相对会弱一些,受家乡的影响相对就要多一些,其观念可能比那些长时间不回家的妇女要接近于未外出妇女。我们的这一假设在安徽得到了证实,至少每月回家一次的安徽外出妇女只想要一孩的比例和未外出妇女非常接近,约为18%;但是每半年以上回家一次的妇女只想要一个孩子的比例为33.2%,远高于至少每月回家一次的妇女,也高于未外出妇女。但从四川外出妇女组中观察不到这种差别。

妇女外出期间是否有工作以及所从事的职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妇女的个人特征如文化素质和综合素质的高低以及经济收入状况,也能够反映妇女在流入地的交往对象,因此可以用这一指标来考察不同人群的理想子女数是否有差异。从安徽的情况来看,外出期间当雇员的妇女和外出期间自己干个体经营的妇女的理想子女数没有太多差异,而没有工作的妇女比这两组妇女想要更多的孩子,构成没工作的妇女和有工作的妇女的明显差异。而四川外出妇女由于职业比较单一,没有工作和当个体老板的样本量太少,难以进行有意义的比较。

和丈夫一起外出的妇女相对于没有和丈夫一起外出的妇女而言,在自身的独立性、生育机会等方面不同,因此是否和丈夫一起外出对理想子女数的影响潜在地隐含了其他因素的作用。从表面观察,安徽和丈夫一起外出的妇女只想要一个孩子的比例(26.6%)要低于没有和丈夫一起外出的妇女(35.1%),且差异显著(卡方检验结果 $p=0.017$ )。虽然四川组的差异不显著,但也呈现了同样的趋势,即与丈夫一起外出的妇女只想要一个孩子的比例(35.5%)低于没有和丈夫一起外出的妇女(42.1%)。

“回到家乡已有多长时间”是指外出妇女最后一次外出回来后距调查时点的时间长度。一般而言,妇女外出后会在一定程度上习惯流入地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但是由于城市和农村的差别,回到农村的家乡后,社会舆论的力量会迫使很多妇女多多少少有些被动地重新调整自己的行为模式(诸如穿着打扮)和一些观念(诸如对未婚同居的看法),接受家乡能够被认同的行为和观念,从而再次适应农村社会的生活。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回到家乡有多久对于外出妇



女的观念可能有着较大的影响。从被调查妇女的情况来看,回到家乡不到一年和回到家乡已有一到两年的妇女之间差异并不大,但是她们和回到家乡已有三年到五年以及六年以上的妇女有较大差异,且呈现回到家乡时间越长理想子女数就越多趋势。这一趋势在控制了年龄以后依然存在。

以上分析是在没有完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有些相关关系可能是虚假的关系,有必要通过多变量分析来进一步考察这些关系。多变量分析模型中的控制变量与前面第一部分相同。不同的是这部分的模型只包括曾经外出的已婚妇女,自变量则是所有与外出经历有关的变量,即:外出期间交往情况(以外出期间是否和同事雇主交往来衡量),外出期间回家情况,累积在外滞留时间,回到家乡已有多久,外出期间工作性质,是否带孩子外出,外出期间居住情况,外出是否跨省,流入地类型(分为大城市、中小城市、镇或农村)。分析时仍然采用反向剔除法对变量进行筛选。

从分析结果看,外出妇女所居住的县、村人均收入、文化程度、年龄等社区和个人特征对理想子女数的作用呈现出与表4一致的结果(见表5)。但是在外出以及与外出有关的变量中,只有回到家乡已有多久以及在外期间的居住方式对理想子女数有显著影响。回到家乡时间较长的妇女想要的子女数相对较多。与丈夫租房同住的妇女想要的子女数相对较多,而住集体宿舍的妇女由于可以和来自于其他各省市的很多打工同事交往,其生育观念多多少少地受到一些影响,从而减少了理想子女数。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外出居住方式和回到家乡已有多久以外,其他外出经历并没有被纳入到模型中,说明在控制了个人、社区等因素后,外出的一些经历如外出期间回家情况、累积在外滞留时间、外出期间工作性质、外出是否跨省、流入地类型等并没有造成外出妇女之间理想子女数的差别。

#### (四)小结

通过以上分析,本研究的主要发现可以总结为:

1. 在相同的年龄、文化程度等条件下,外出妇女的理想子女数要少于未外出妇女,外出对妇女理想子女数的减少具有显著的作用。
2. 在对子女的性别偏好上,外出妇女和从未外出妇女没有显著差别。
3. 外出妇女回到家乡的时间越长,其理想子女数与家乡未外出妇女就越趋近;回到家乡多年的妇女只想要一个孩子的可能性低于那些刚刚回乡不久的妇女。
4. 一些外出经历如外出期间回家情况、累积在外滞留时间、外出期间工作性质、外出是否跨省、流入地类型等的不同并没有造成外出妇女之间理想子女数的差别。

### 四、讨 论

从定量分析结果可见,外出妇女和未外出妇女在生育意愿上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来自于两方面:外出妇女的选择性特征带来的差异和外出带来的差异。对于选择性特征带来的差异我们较易理解,然而外出究竟是通过何种机制和途径影响生育意愿呢?我们结合访谈资料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生育意愿属于观念层面的范畴,其发生和变化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和模糊性,当事者也未必能够认识到自己生育意愿形成或改变的原因。但是根据定量分析结果并结合访谈资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外出影响生育意愿的方式和途径。我们认为,外出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很大

程度上是通过影响外出妇女的生活方式和观念达到的,可以被认为是一种递进式的影响,这期间含着研究背景中提到的适应模式。妇女在城市务工经商一段时间后,其生活方式会发生一种共同的变化,即生活方式城市化倾向的出现。我们在访谈中了解到,农村年轻妇女在城市生活一段时间后,其衣着打扮、卫生习惯等都向城市居民趋近,一些妇女穿上了吊带裙、露背装,有的还染了头发、涂抹在农村时从未用过的胭脂口红,大部分妇女在城市里变得更加讲究卫生。在城市的生活不仅使外出妇女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而且也改变着她们的观念和思想,她们逐渐能够接受未婚同居,更加注重寻求自身的发展、实现自身的价值。在访谈中,很多外出妇女都谈到希望能在城市里找一份好工作,有的表示愿意自费参加一些技术和职业培训以获取更好的发展机会,这些妇女大多表示不愿意过早生育子女而受到拖累。在城市文化潜移默化的熏陶下,外出妇女对孩子效用的看法也有了改变,当问及是否愿意多生几个孩子以作养老之用时,一些外出妇女表示“老了还得靠自己,靠自己是最安全的”、“城市里有养老保险,可以靠养老保险”,说明子女的养老效用在外出妇女的眼中已降低。外出能够带来如上所述的生活方式和观念的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又通常有利于妇女减少其想要的孩子数,使得外出妇女的生育意愿发生改变。

既然是通过文化适应性和同化性使外出妇女的生育观念得以改变,那么这种变化的强度和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妇女接触城市文化的广度和深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妇女的职业、交往群体等就显得较为重要。我们的定量分析结果显示,住集体宿舍的外出妇女的理想子女数少于和丈夫居住的外出妇女,在企事业打工的外出妇女的曾生子女数少于没有工作的外出妇女,这很大程度上与居住方式和有无工作带来的妇女对城市社会的深入不同从而导致观念的不同有关系。在此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在控制了年龄、文化程度等因素后,回到家乡越久的妇女的生育意愿与其家乡未外出妇女就越相近,这似乎能够从另一个角度表明在生育观念上文化适应性和同化性的存在。访谈中一些妇女表示回到家乡后不习惯农村的生活,如在穿戴打扮上不能太时髦,否则就会受到议论,但时间长了也就慢慢再次习惯了家乡的生活方式,按照一些妇女的话说,“风俗习惯就是这样的,如果你不遵从,你就无法在这里生活,别人会说闲话的”。所以她们必须依从农村社区的文化和习俗,久而久之外出带来的变化也逐渐消失,其中也包括生育观念。

当然,流入地的生育文化也可能直接对农村外出妇女的生育观念产生影响。通常,城市居民只生育一个子女,这对外出妇女有一定的示范作用,由于对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的向往和憧憬,外出妇女很可能会模仿城市居民的行为,从而认为不需要太多的子女,访谈中有的妇女就表示“城里人都只有一个孩子,也过得挺好的”。

值得特别提出的一点是,外出并没有改变妇女的性别期望,表明性别期望的变化较之生育数量的变化而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这与风笑天的研究结果相似(风笑天、张青松,2001)。

外出带来的生育意愿方面的改变可能会导致生育行为的变化,但是由于外出返乡妇女并没有脱离农村,仍然会受到农村生育文化和生育习俗的辐射和影响,有时甚至要承受来自于家庭的压力,这种生育意愿的转变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实际的生育行为尚难定论。

既然外出有利于妇女减少理想子女数,从改变妇女的生育观念这一角度来看,农村妇女所在地政府应该鼓励妇女外出,当妇女回到家乡后应及时地了解其在外面的生活以及其观念的变化,并且鼓励和组织回来的妇女在乡里起示范作用,通过座谈等方式将其所见所闻所感诉诸于众,从而影响未外出妇女的观念,也借此改变当地社区对外出返乡者的生活方式和观念的不

认同状态,使外出回来的妇女能够带动整个社区文化的改变和发展。

由于资料有限,本文在生育意愿的分析中未涉及生育目的和动机这一维度,但是对于生育观念而言,生育目的和动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维度,它影响着妇女对于生育数量和孩子性别的选择。同时,丈夫生育观念的转变也是同等重要的,而这是本研究所未能涉及的一个方面。本文的理论框架虽然包含了较多的内容,也有着动态的体系,然而由于条件有限,一些影响因素没有能够分析,如流入地的生育文化对妇女的影响以及影响机制等。我们将在后续的研究中尽力弥补这些缺憾。

#### 参考文献:

- 敖再玉, 1990《我国迁移与非迁移已婚妇女生育水平的差异》,《人口动态》第4期。
- 陈浩, 1996《中国农村劳动力外流与农村发展》,《人口研究》第4期。
- 陈再华, 1996《外出人口特征研究》,载蒋正华主编《1992年中国生育率抽样调查论文集》,中国人口出版社。
- 杜鹰、白南生等, 1997,《走出乡村》,经济科学出版社。
- 段成荣, 1998《流动人口对城乡社会经济的影响》,《人口研究》第4期。
- 顾宝昌, 1992《论生育和生育转变:数量、时间和性别》,《人口研究》第6期。
- 风笑天、张青松, 2001,《二十年城乡居民生育意愿变迁研究》,待发表。
- 黄润龙, 2000《农村人口流动的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因素分析》,《1997年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论文集》,中国人口出版社。
- 马侠主编, 1994《中国城镇人口迁移》,中国人口出版社。
- W. 默斯顿, 1985《人口迁移的影响》,《人口资料》第7期。
- 乔晓春, 1999《关于二十一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的思考》,《人口研究》第3期。
- 谭晓青, 1994《城镇人口迁移与生育》,马侠主编《中国城镇人口迁移》,中国人口出版社。
- 王平权, 1996《农村→城镇迁移人口行为对生育行为影响的几点认识》,《人口学刊》第1期。
- 伍先江, 2000《近年来我国流动人口特征浅析》,《1997年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论文集》,中国人口出版社。
- 解振明执笔, 2001,《人口流动对农村妇女计划生育与生殖健康的影响》,《人口与计划生育》第5期。
- 杨子慧, 1991,《流动人口的生育行为》,《人口与经济》第3期。
- 郑真真, 2001,《关于人口流动对农村妇女影响的研究》,《妇女研究论丛》第6期。
-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农村外出务工女性”课题组, 2000《农民流动与性别》,中原农民出版社。
- 周祖根, 1993《人口迁移流动与生育》,《人口学刊》第2期。
- Pritchett, L. H. 1994, “Desired Fertility & 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Policie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
- Thomson, E. & Brandreth, Y. 1995. “Measuring Fertility Demand.” *Demography*, 1.

作者尤丹珍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研究生

郑真真系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教授

责任编辑:谭深